

# 世界不是平的

## ——新媒體與社會發展的多元化

● 趙月枝

**韓曉東：**新媒體有哪些主要形態？您是從哪個角度研究的？

**趙月枝：**新媒體是一個很寬泛、多層次的動態概念。作為使用者，我們會從終端出發，馬上想到互聯網、手機等，以及各種應用；但是作為傳播制度的研究者，我更願意從這些媒體所依附的基礎網絡，以及基於這些網絡的各種應用來綜合考慮。也就是說，從所謂的「信息高速公路」和在上面跑的「車」的整個系統來考慮，當然這些「車」還屬於不同的家庭、機構和運輸公司，也就是不同的媒體機構和社會信息傳播主體。

**韓曉東：**「沒有新媒介的發展和社會使用，就沒有全球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一體化進程。」這是2007年11月的北京論壇「多元文化、和諧社會與可選擇的現代性：新媒體與社會發展」分論壇論旨闡述中的一句話，我們應該怎樣理解？

**趙月枝：**我覺得這句話是新媒體時代的一個迷思，需要解構。當然，任何一個迷思都有合理的部分，從世界各大股票交易中心的計算機終端如何支撐龐大的全球金融資本的流動，到互聯網如何把世界各角落的使用者連成一體，再到消費文化的全球化，這句話確實有其合理性。但與此同時，這句話又掩蓋了很多真相。

**韓曉東：**那麼，如何解構這句話呢？

**趙月枝：**我從兩方面來分析。第一：這句話體現了典型的媒介決定論。它所規定的因果關係，體現了一種簡單的線性思維邏輯。事實上，媒體的發展與社會使用，不管是新的還是舊的，與具體歷史時期的特定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形態，總是有的一種相互促進、互為構建的關係。新媒體之所以在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得到蓬勃發展，是與上個世紀70、80年代以來，全球傳播政治經濟領域在新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放鬆管制、市場化和全球化變革相關的。而這些變革更深刻的政治經濟根源，則要追溯到西方資本主義積累模式從二戰後的福特主義向彈性積累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資本要擺脫民族國家和西方福利制度有關勞工待遇和公共利益的約束，與世界各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更廉價的勞動力結合，從而克服資本積累的危機。而計算機網絡、電信網絡在這一新積累方式的實現中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到中國而言，大家都知道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國家政策優先發展電信——尤其是沿海開放地區的電信網絡——以吸引外資、促進向外型經濟的發展，使中國以自己的廉價勞動力、優惠的稅收等「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市場體系的大循環，這個過程與這句話所指的「一體化」有密切的關係。

當然，作為以上所說的「一體化」過程的一部分，急速發展的電信網絡、計算機網絡和廣播電視網絡就成了我們今天所說的新媒體離不開的基礎網絡。與此相關，從手機短信到視頻點播等電信和廣播電視增值業務的發展，都離不開這些產業自80年代以來的放鬆管制和商業化改革。正是這種全球經濟中的變化，為新媒體的發展與社會使用創造了制度性的前提，而新媒體的發展與使用又反過來促進了數字化資本主義和網絡社會的興起。

**韓曉東：**第二層面的解構又從何說起？

**趙月枝：**「全球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一體化」這個概念。這裏有一個由誰來主宰、在甚麼價值體系下「一體化」的問題。是新自由主義的資

本主義全球化，還是我們曾經高唱過的《國際歌》中追求的超越了資本剝削的全球化，抑或是甚麼新的全球主義和其他甚麼主義、甚至是教條上的「一體化」？蓋茨(Bill Gates)曾有過「沒有摩擦的資本主義」的幻想。2005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專欄作家、新媒體和資本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弗萊德曼(Thomas L. Friedman)出版了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但這只是一廂情願和一面之詞。的確，柏林牆是倒了，但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的民族衝突又發生了；歐盟形成了，但法國巴黎市郊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帶有強烈種族和階級色彩的騷亂。在北美，美國與墨西哥邊境有形無形的用於堵塞墨西哥非法移民的牆更是戒備森嚴。因為，雖然資本投資是一體化了，勞工卻沒有一體化。不同國家的邊界，甚至是在一個國家內部用人為的戶口制度造成的勞動力價格非一體化正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推進的條件之一。

更有甚者，在反恐語境下，原來加拿大與美國之間基本不設防的邊境也出現了重重關卡。恐怖主義的興起，可以說是對上面這句話所說的那種「一體化」帶來的文化衝突的一種逆反。弗萊德曼說世界是平的，作為全球新媒體發展的重要中心城市——印度的班加羅(Bangalore)的景象是他觀點的重要印證之一。恰巧去年1月份，我也去過班加羅，參加那裏的一個有關如何使世界的貧困人口能有基本電信服務的研討會。我發現班加羅的街道不是很平。到了最後一天，當我們好不容易有時間看看整個市容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們已經無法在班加羅自由旅行。你猜為甚麼？因為城市

裏的一些伊斯蘭市民因抗議美國處死薩達姆遊行，引起了部分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市民間的種族騷亂，當局對部分地區實施了戒嚴。我們在想，弗萊德曼這樣的全球化精英，肯定是空降到班加羅與平民百姓隔絕的高新信息技術和新媒體開發區，所以才會得出「世界是平的」的結論。

總之，新媒體的發展與社會使用在促進了資本主義框架下的全球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同時，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社會的斷裂、文化的錯位，也導致了世界公民社會不同力量的抗爭。而且抗爭者也在運用新媒體來追求他們自己理想中的「一體化」。一方面，互聯網等新媒體成了各種宗教和類宗教進行社會動員、塑造特定的身份認同的有效傳播工具；另一方面，也正是互聯網在1994年首先把墨西哥契亞帕斯 (Chiapas) 原住民反對新自由主義一體化的抗爭聲音傳到了世界各地。1999年，以互聯網為核心的獨立媒介，更是在西雅圖發生的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抗爭運動的集體組織者和鼓動者。

**韓曉東：**那對於「多元文化、和諧社會與可選擇的現代性」這一主題，趙教授作何理解？

**趙月枝：**我希望從我上面談到的視角來理解這個主題。一方面，由於新媒體的發展與推廣所促進的新自由主義全球一體化，給某些地區、某些人群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方便，另一方面，不同地區間不平衡的發展與文化鴻溝的加深，也促進了各種左的、右的、宗教的、世俗的社會抗爭運動的興起。這一歷史發展說明，現有模式的一體化或曰全球化，在一定意義

上是一種世界觀和一種文化，也即消費主義文化的全球化，而這一過程並沒有帶來世界和諧。

這次北京論壇的主題中，用了「可選擇的現代性」一詞，我覺得非常意味深長。這一概念挑戰了一種模式的現代化道路。這使我想起「世界社會論壇」等各種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社會運動中的一句流行口號：「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當然這裏隱含的是對一種更公平、更正義的世界秩序的追求。

**韓曉東：**新媒體給我們帶來的便利和衝擊有哪些？其導致的變化又是怎樣的？

**趙月枝：**這個問題使我想起了葛優主演的電影《手機》，手機在給我們帶來便利和新的自由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束縛和羈絆。同樣，在工作場所，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應用，使僱員們有可能「假公濟私」，在上班時間與朋友聊天，甚至偶爾玩玩遊戲；而在另一方面，老闆們也可以通過手機隨時隨地找到僱員，從而將私人空間更全面地納入了資本積累的軌道。更重要的是，如我的一位美國同事所論，我們不能單向地歡呼新媒體技術對個體自由的增進，而應該從社會結構與技術互動的角度來把握新媒體的社會意義。比如移動電話的流行，與普通勞工勞動時間和花在上下班路上的時間普遍延長這些日常生活壓力加大的結構性因素相關，是人們希望對節奏愈來愈快，流動性和不穩定性不斷增加，而且幾乎失去控制的社會生活取得某種程度的個人控制的努力的一部分。

**韓曉東：**網絡論壇和博客對公共輿論帶來怎樣的衝擊和改變？

**趙月枝**：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這幾年在國內，以孫志剛事件為主要標誌，網絡論壇和博客等新媒體在影響公共輿論方面產生了巨大的社會作用。不過回到我上面所堅持的對媒體決定論的警惕，我更願意從新媒體背後的社會傳播權利的重新分配角度來思考。媒體是社會表達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傳播權利在社會不同群體中的分配。在不平等的社會中，社會話語權的分配是不平衡的，而這種不平衡又促進了不平等的社會制度的維護與鞏固。一部傳播史既是新媒體不斷出現的歷史，也是不同社會群體爭取話語權、爭取社會表達權利的歷史。

在傳播史上，新媒體的興起往往與新的社會群體對社會話語權的爭取結合在一起。在西歐歷史上，印刷媒體的興起即緣自新生的資產階級致力打破教會和僧侶對知識的壟斷，也就是說，新的社會勢力通過新媒體獲得了話語權。在當今世界，如果看一下網絡論壇和博客等新媒體的最活躍的使用群體，和他們所關注的社會議題、表達的觀點與情感，就會發現他們大多是傳統媒體(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等)中沒有充分話語權的群體。

從近年來一系列網絡事件中可以看出，新媒體在擴大社會話語空間、反映中下層民眾關注的話題等方面，給傳統媒體和主導傳統媒體話語權的社會團體，以及他們的社會傳播議題，帶來了很大的衝擊。當然這也引起了傳統勢力的吸納、警惕和反彈。應該說，新媒體在拓展公共傳播議題、促進社會傳播多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韓曉東**：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新媒體與舊媒體的關係？

**趙月枝**：沒有必要將兩者對立，我們最需要關注的不僅僅是新媒體本身的作用，而是新舊兩者之間的互動，甚至還要看到超出兩者之外的人際傳播在新的傳播環境下的重要作用。我在即將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國的傳播：政治經濟、權力與衝突》(*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一書中，嘗試對一系列由新媒體引發的事件加以分析，我注意到孫志剛事件實際上是由作為傳統媒體的《南方都市報》最先曝光的，而國內學者羅崗的研究表明，人際傳播——更具體地說是以孫志剛大學同學為基礎的中國知識份子人際網絡，在推動整個事件的媒體輿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所以，對於包括網絡論壇和博客在內的新媒體對公共輿論的衝擊和改變，不但要從媒體背後的社會表達群體要求對現有話語權重新分配這一社會角度去理解，還要從一個包括人際傳播和舊媒體在內的不同傳播渠道互動的傳播生態的角度去把握。

**韓曉東**：新媒體環境下公民社會的建設遇到了哪些新問題？

**趙月枝**：與以上的分析框架相一致，我覺得這個問題首先要從舊媒體環境下公民社會的建設所面臨的挑戰來把握。當然，在不同國家和媒體制度下，公民社會的建設遇到的問題各有不同。這裏我僅從國際傳播的角度泛泛而談。實際上傳播學者對這方面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而許多學者關注的核心是在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邏輯主導下，統治性政治經濟權力，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尤其是資本和大公司權力，對公民社會充分的社會表達

所構成的威脅。在這方面，西方傳播學者的文獻在國內也有了不止翻譯、傳播。我的加拿大同事、拙著《維繫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的合作者哈克特(Robert A. Hackett)教授，在他的新著《再造傳媒》(*Remaking Media: The Struggle to Democratize Public Communication*)中，結合各方面的文獻，提出了公民社會傳播所面臨的八大挑戰：公共領域的失敗、權力的集中、傳播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公共話語的同質化、對社區意識的損害、以跨國公司利益為主導的知識產權體系對人類知識共同體的圈地、社會文化傳播政策制訂過程中精英主導和缺乏足夠的公眾參與、在電子傳播領域對民權的侵害。

新媒體的出現一方面改變了現有的媒體生態，包括上面所談的對社會傳播民主化的促進，但在另一方面，現有的政治、經濟勢力也加強了對新媒體的控制。在資本控制方面，最新的例子就是默多克(Rupert Murdoch)對MySpace網站的併購。新媒體使大公司就一個網頁或一段音樂的收費成為可能，使公民社會的傳播愈來愈受制於資本積累的邏輯。

**韓曉東：**我們要警惕新媒體的資本化嗎？新媒體的資本化對公民社會會產生哪些影響？

**趙月枝：**在國外，對許多學者來說，這不是要不要警惕的問題，而是公民社會如何從現有的高度資本化的新媒體中爭取表達空間的問題。如前所述，新媒體的發展本身就與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積累方式的演變密切相

關，是整個過程的關鍵部分。雖然互聯網的雛形是非資本環境下的美國軍事、科研部門的產物，但是到了後來，可以說資本本身就是新媒體的助產士、養母和教父。雖然中國的情形不太一樣，但許多新媒體的研發公司都有國際風險投資背景，中國的三大門戶網站都在美國納斯達克(NASDAQ)上市，甚至中國的主要電信營運商也已上市——幾年前，國內信息產業管理部門一句「手機要不要單向收費」的傳言，就引起了相關資本市場的震動。

資本為了牟利，就必然要使社會話語權的分配為其所用，在內容上使社會的價值體系更張揚消費主義、利己主義和私人佔有等觀念。我曾在《維繫民主？》等論著中論及：資本積累的邏輯和公眾服務的原則是有衝突的。新媒體發展中以市場為導向的原則，不可避免地加深了所謂的數字鴻溝與知識鴻溝，也就是社會的不平等。因此，一邊是邊緣化的群體連接受教育、成為識字的公民的權利都得不到實現，一邊是新媒體發展商千方百計地推出高技術和新服務，爭取富裕的都市消費群體。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廣告商對新媒體發展的影響愈來愈大，而廣告商青睞的是高消費的社會群體和他們的傳播需要。總之，資本主導的「一元一票」的市場邏輯與理想中的公民社會傳播的「一人一票」的邏輯是截然不同的。

**趙月枝** 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傳播學院加拿大國家研究教授

**韓曉東** 《中華讀書報》記者